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1), 190-19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11914

Hans汉斯

“指责－讨好”之外：家庭亲子沟通困境的生成机制与本土化调适思考

——基于大龄二孩家庭的质性研究

胡　莹，朱　媛*，陈璟涵

广西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设计学院，广西　柳州

收稿日期：2026年8月31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2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3日

摘　要

大龄二孩家庭存在突出的亲子沟通困境，手足巨大年龄差引发家庭角色重构与情感资源再分配，本土家庭伦理与抚育压力交织，易造成亲子沟通系统失衡。本研究以家庭系统理论、萨提亚家庭沟通理论为分析视角，对社区10户大龄二孩家庭的父母与青春期长子女开展半结构化质性访谈。研究发现，“指责－讨好”是该类家庭亲子沟通失衡的典型表现，它由情感资源分流、高龄抚育压力、对长幼伦理的片面解读、不良沟通代际传递等多重因素耦合形成，长子女还会出现回避、对抗等差异化沟通反应。本研究反思萨提亚“表里一致”沟通理念与本土家庭存在文化适配鸿沟，主张立足本土现实审慎借鉴西方家庭干预理论。本研究为小样本质性探索，结论具备理论迁移价值，不具备统计普适代表性，可为基层家庭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亲子沟通困境，指责－讨好，家庭系统，萨提亚家庭沟通理论，社会工作

Beyond “Blame-Appease”: Mechanism and Localized Adjustment Thinking o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Dilemma

—A Qualitative Study of Older-Age Two-Child Families

Ying Hu, Yuan Zhu*, Jinghan Ch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rts and Design,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胡莹, 朱媛, 陈璟涵. “指责-讨好”之外: 家庭亲子沟通困境的生成机制与本土化调适思考[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1): 190-198. DOI: 10.12677/ass.2026.1511914

Received: August 31, 2026; accepted: November 2,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3, 2026

Abstract

Older-age two-child families face prominent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dilemmas. The substantial age gap between siblings triggers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mily roles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emotional resources. The interplay of indigenous family ethics and parenting pressures readily gives rise to imbalanced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systems. From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of family system theory and Satir's family communica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nducts semi-structure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parents and adolescent eldest children from 10 community-based older-age two-child famil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blame-appease" pattern serves as a typical manifestation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imbalance in such families. This pattern results from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diverted emotional resources, high-stress parenting among elderly parents, one-sided interpretations of senior-junior ethic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ys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Adolescent eldest children may also exhibit differentiated communication responses such as avoidance and confrontation. This study reflects on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gap between Satir's "congruent communication" concept and local household realities, and advocates prudent reference to Western family-intervention theories grounded in local contexts. As a small-sample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this paper yields theoretically transferable findings rather than statistically generalizable results,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localized practice of grassroots family social work.

Keywords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Dilemma, Blame-Appease, Family System, Satir's Family Communication Theory, Social Work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生育政策持续调整，二孩全面放开、三孩配套政策相继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基层婚姻家庭辅导与科学育儿公共服务[1]。政策带动下，不少 70 后高龄父母生育二孩，催生大量手足年龄差 13 周岁以上的大龄二孩家庭[2]。长子女已形成独立自我意识，面临从独生子女向兄姐的角色转型，家庭情感分配模式重构，亲子沟通矛盾凸显，现实中大龄二孩家庭易出现沟通内容窄化、情绪性沟通缺失、长子女情感被忽视等多重困境，“指责–讨好”仅属于亲子沟通失衡亚型之一。现有研究多聚焦大龄二孩家庭的同胞冲突、长子女心理健康问题，对亲子沟通过程、沟通姿态与互动模式的实证探讨相对薄弱，当前萨提亚等西方家庭沟通理论被大量运用于本土家庭实务，但不少研究直接照搬理论框架，针对本土文化约束下亲子沟通困境生成机制的本土化实证反思仍有待拓展[3]。基于社区实习的质性访谈资料，本文聚焦大龄二孩家庭亲子沟通问题，解析“指责–讨好”这一失衡亚型的内在生成逻辑。本研究并不追求构建普适化干预方案，重在挖掘本土家庭现象背后家庭、文化、现实压力的多重作用机制，为家庭社会工作实务与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2.1. 多子女家庭亲子关系相关研究述评

2.1.1. 亲子沟通相关理论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亲子沟通是家庭成员之间信息交换、情感传递与观点协商的互动过程，是家庭沟通子系统的核心组成，承担情绪支持、行为引导、角色调适的重要功能。良性的亲子沟通能够维护家庭系统稳态，而不良亲子沟通则会放大家庭矛盾，诱发家庭成员的情绪、行为问题。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内部存在独立的沟通子系统，沟通子系统串联夫妻、亲子、同胞等各个子系统，家庭外部或内部产生的压力不会局限于单一个体，会经由沟通子系统传导扩散，改变家庭原有平衡状态；家庭压力下的沟通失调，往往是家庭系统失衡的外在表征，而非单纯个体性格问题[4]。

萨提亚家庭沟通理论诞生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该理论认为个体面对压力时会演化出五种沟通姿态：指责、讨好、超理智、打岔、表里一致。指责型沟通优先维护自身立场，习惯批评归罪他人，忽视对方感受；讨好型沟通以牺牲自我需求为代价，一味顺从迁就，以此规避冲突；超理智沟通过度看重道理逻辑，回避情绪感受；打岔型沟通回避当下议题，转移话题逃避压力；表里一致沟通则兼顾自我、他人与情境，实现感受与表达统一[5]。西方原有研究多将指责–讨好类沟通姿态与个体自尊水平绑定，把讨好行为归因为个体低自我价值的人格特质。国内引入萨提亚理论后，被广泛应用于家庭社会工作实务，多用于亲子冲突的干预辅导。与此同时，越来越多跨文化研究提出反思：根植个体主义的表里一致沟通范式，与我国集体主义家庭文化存在天然张力，顺从退让不完全等同于人格缺陷，可能包含维系家庭整体和睦的集体诉求，直接照搬理论工具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相关本土化实证研究仍较为匮乏。

国外多子女家庭亲子沟通研究较早关注压力事件对家庭沟通模式的重塑，发现新增子女会重构家庭沟通规则，长子女的沟通表现是家庭压力与家庭互动共同塑造的结果。国内普通二孩家庭研究显示，二孩降生容易带来亲子沟通内容窄化、情绪沟通缺失等问题；而大龄二孩家庭因长子女年龄更大、自我意识已经成型，家庭角色落差更为突出，亲子沟通矛盾的表现形式、内在机理和普通二孩家庭存在明显差异。

2.1.2. 多子女家庭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大龄二孩家庭的研究，多聚焦同胞关系质量、长子女心理适应与家庭教育策略层面。现有研究普遍发现，二孩降生会造成家庭情感、物质资源稀释，长子女易滋生嫉妒、失落等适应不良问题[6]，而长子女适应不良背后折射家庭亲子沟通的失衡，父母差别对待是诱发家庭冲突的重要诱因。但不少研究倾向把亲子矛盾简单归为个体情绪或者家庭教育观念偏差，较少回归家庭日常互动场景，拆解不良沟通模式的形成逻辑。

在大龄二孩家庭同胞关系中，家庭教养方式、亲子关系会深刻影响同胞相处质量，部分家庭会将手足冲突的责任简单推给长子女[7]。该观点点明了本土家庭伦理在多子女家庭中的现实影响，但现有文献较少进一步探讨：这套“长幼有序”的伦理如何通过日常对话、沟通姿态转化为亲子层面的矛盾[8]，这也是现有研究的一处缺口。从社会学视角看，“长幼有序”根植于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人伦体系，传统乡土社会中的长幼伦理是一套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完整权责框架：年长子女既有谦让、照护年幼弟妹的伦理义务，同时也享有家庭资源分配、话语权等相应权利[9]。但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部分现代家庭碎片化截取传统伦理，片面强调长子女无条件退让的义务，剥离其对应的权利保障，形成异化的伦理实践，这也是本土多子女家庭亲子张力的重要文化来源，却尚未得到充分讨论。

综合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三方面研究缺口：① 多子女家庭研究多聚焦同胞冲突、儿童心理结果，对亲子沟通过程、沟通姿态、互动模式的质性研究不足；② 国内实务大量引入萨提亚沟通理论开展家庭

服务，但针对该理论和本土家庭文化之间适配矛盾的实证研究较少；③ 对于大龄二孩家庭特殊压力情境下，亲子沟通困境的生成机制、文化影响因素的解释有待进一步挖掘，小样本质性研究结论仍有待更多大样本研究加以检验。

2.2. 本文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家庭系统理论与萨提亚沟通姿态理论为双重分析基础。家庭系统理论将家庭视为有机互动整体，家庭内部各类压力不会直接造成家庭矛盾，而是经由亲子沟通子系统传导释放，亲子冲突并非个体问题，而是家庭结构与多方互动共同催生的异化亲子沟通结果，为本研究规避个体归因误区、从沟通子系统层面整体解读家庭矛盾提供核心视角。萨提亚沟通姿态理论则聚焦压力情境下个体的内心与行为选择，将家长指责、长子女讨好的互动表现，界定为家庭系统压力作用下产生的异化亲子沟通姿态，而非个人性格缺陷，为细化拆解亲子互动细节提供分析工具。

基于两大理论，本研究构建核心分析框架：本框架旨在解释大龄二孩家庭的系统压力如何传导至亲子沟通子系统，进而催生“指责–讨好”这类异化的亲子沟通姿态，并形成闭环互动模式。研究以二孩生育引发的情感资源稀释为核心触发变量，从家庭角色分工、亲子日常沟通、手足冲突处理、矛盾应对方式四个亲子沟通相关维度开展访谈观测。其中，个体年龄、性别、偏心感知等差异作为调节变量，解释在同等情感稀释压力条件下，长子女会分化出讨好、回避、对抗等不同亲子沟通应对姿态的原因。高龄抚育压力、异化长幼伦理认知、不良沟通代际传递会诱发家长形成指责型沟通姿态，该沟通姿态与长子女的讨好沟通策略相互强化，最终固化为“指责–讨好”的闭环亲子互动沟通模式。资料分析阶段依次通过开放性编码提取原生概念、主轴编码归纳家长沟通压力、子女沟通策略、互动强化三大类属，最终经选择性编码确立“指责–讨好循环”核心范畴，整体分析框架见图 1。



注：本框架聚焦家庭亲子沟通子系统，分析情感资源稀释压力如何转化为不良亲子沟通姿态；本框架基于家庭系统理论、萨提亚沟通姿态理论构建；情感资源稀释通过四项亲子沟通相关维度观测，个体差异为核心调节变量，调节情感资源稀释与长子女应对沟通姿态的关系；家长指责沟通与长子女讨好策略双向强化，最终形成闭环互动模式。

Figure 1. Conceptual analysis framework
图 1. 概念分析框架

3. 研究方法与样本情况

3.1. 研究方法与样本的选择

本研究为探索性质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数据。依托社区社工实习平台，通过目的抽样选取 10 户大龄二孩家庭，筛选标准为手足年龄差 13 周岁以上、长子女处于青春期(13~19 岁)且家庭成员自愿受访。研究共访谈父母与长子女 20 人，采用亲子双视角资料交叉印证，还原家庭互动状况。访谈围绕家庭角色分工、亲子日常沟通、手足冲突处理、矛盾应对方式四个维度开展，访谈地点设置在社区社工站或受访家庭内，单次访谈时长 40~60 分钟。访谈录音 24 小时内完成逐字转录，通过三级编码分析，探究“指责–讨好”亲子沟通模式的形成机制。

为保障研究可信度，设置双重质控方式：一方面比对同一家庭亲子双方访谈内容，回溯原始文本复核研究结论；另一方面编码阶段联合同领域研究者校准编码标准，降低单人研究带来的主观偏差。

10 户受访家庭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本研究依据主轴编码结果划分家庭类型：父母指责类沟通编码、

长子女讨好类沟通编码占比均超 60%，定义为“指责－讨好型”家庭；其余样本依据高频互动特征划分为回避疏离型、冲突对抗型与波动混合型。本研究以指责－讨好型家庭作为核心分析样本，其余类型用作对照，分析长子女差异化的亲子沟通应对姿态。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d families
表 1. 受访家庭基本情况

序号	长子女性别	年龄差	同胞结构	家庭类型	核心矛盾表现
家庭一	女	15 岁	姐弟	指责－讨好型	沟通表现为讨好顺从，内在情绪压抑，亲子沟通存在隔阂
家庭二	男	13 岁	兄妹	回避疏离型	长子女沟通上沉默回避，主动亲子交流较少
家庭三	女	18 岁	姐妹	指责－讨好型	外在行为讨好，试图通过付出换取家庭关注，内心存在委屈感
家庭四	男	16 岁	兄弟	冲突对抗型	亲子沟通对抗性强，易发生言语冲突
家庭五	女	14 岁	姐弟	波动混合型	亲子沟通状态不稳定，顺从与情绪爆发交替出现
家庭六	男	17 岁	兄妹	回避疏离型	沟通消极被动，较少参与家庭沟通事务
家庭七	女	19 岁	姐妹	指责－讨好型	过度承担家庭照料责任，较少表达个人内心诉求
家庭八	男	15 岁	兄弟	波动混合型	表面顺从，情绪向内积压，偶有情绪爆发
家庭九	女	16 岁	兄妹	指责－讨好型	冲突中主动让步，优先维护家庭表面和睦
家庭十	男	14 岁	姐弟	冲突对抗型	亲子沟通对抗，家庭成员间隔阂较深

注：家庭类型依据主轴编码得到的亲子互动主导特征划分。“指责－讨好型”指家长以指责说教为主、长子女以顺从讨好为主的互动模式；“回避疏离型”指长子女以沉默、减少沟通为主要应对；“冲突对抗型”指长子女以直接争吵、拒绝沟通为主要应对；“波动混合型”指长子女在讨好与对抗之间反复切换。文中引用编号“F1-1”指家庭一的长子女，“M7-1”指家庭七的母亲。

3.2. 研究伦理与研究局限

本次调研严格恪守社会工作研究伦理。访谈前向受访者说明研究目的、保密原则及随时退出的权利，获取口头知情同意；针对未成年受访者同步征得监护人许可。所有访谈资料均做匿名编号处理，转录文本仅用于学术研究。

3.2.1. 质性研究方法论说明

本研究采用质性目的抽样，研究目标并非测算现象在总体中的发生概率、追求统计意义上的总体推广，而是挖掘大龄二孩家庭一类特殊亲子沟通困境的内在生成机制，重点实现理论迁移价值，即提炼可用于解释同类家庭现象的分析逻辑，而非代表全部多子女家庭的现实状况。小样本质性研究的价值在于对现象过程、内在机理做深度剖析，为后续大样本研究提供分析视角与研究假设。

3.2.2. 研究局限与后续研究展望

第一，样本条件局限。本研究仅选取单一城市工薪社区 10 户家庭，样本量有限，地域、社会阶层覆盖面狭窄。“指责－讨好”仅为大龄二孩家庭亲子沟通失衡的其中一类模式，不能代表全部大龄二孩家庭亲子沟通现实，该模式实际发生比例、群体影响范围有待后续大样本量化研究检验；同时本研究限定手足年龄差 13 周岁以上的大龄二孩家庭，相关分析结论不可直接迁移至普通年龄差的二孩家庭。

第二，数据来源的固有局限。本研究属于横截面研究，全部资料来自受访者回溯式半结构化访谈，未开展参与式观察，只能捕捉受访者主观感知的亲子沟通事件，难以完整复刻家庭现场真实互动，存在记忆重构、社会期望作答带来的偏差；也无法追踪观察亲子沟通模式随家庭生命周期推进发生的动态演

化。

尽管本研究采用亲子双视角口述交叉印证、编码一致性检验等效度策略，尽可能弥补资料短板，但仍存在上述客观不足。后续可开展大样本问卷调查，检验本研究所提炼的亲子沟通困境、“指责－讨好”沟通模式在多子女家庭中的分布情况；开展纵向追踪研究，观察家庭生命周期变迁之下亲子沟通模式的动态变化；引入参与式观察方法，弥补回溯访谈的数据局限，进一步检验本土化家庭干预方案的实践成效。

4. “指责－讨好”互动模式的现实表征与形成机制

4.1. “指责－讨好”的互动表征及其情感代价

“指责－讨好”是大龄二孩家庭在多重家庭压力下演化形成的异化亲子沟通闭环模式，指责、讨好属于压力触发下的沟通姿态，并非家庭恒定标签，会随场景、压力强度发生动态转换。同一家庭在手足冲突、学业督促等高压力事件中更容易表现出高强度的该类沟通姿态，而在休闲放松的低压力情境下，亲子沟通可回归相对平和的状态。部分家长的沟通呈现指责说教特征，亲子对话聚焦长子女学业表现；当长子女表露低落、抵触情绪时，家长易将情绪表现简单归因为“不懂事”，忽视子女内心诉求，评判式沟通拉大亲子心理距离。

面对高频的指责式沟通，部分青春期长子女发展出讨好型沟通应对策略。该行为可以划分为情感性讨好与工具性讨好两类：情感性讨好发自内心认同自身家庭角色，自愿承担家庭责任；工具性讨好属于被动的沟通自保策略，长子女通过顺从、付出行为缓和冲突，以此换取父母的接纳与关注，本研究样本中长子女的讨好行为大多属于工具性动机，并非发自内心的自愿“懂事”。

除讨好之外，长子女还会出现回避、对抗等差异化沟通姿态。“指责－讨好”具备动态闭环特征，并非始终维持高强度状态：家庭压力不断累积到达阈值，原本采取讨好姿态的长子女也会转向对抗沟通。家长容易把长子女的表面顺从视作沟通教育起效，进一步固化指责类沟通习惯；长子女持续付出却得不到对等情感回应，情绪不断积压，容易诱发厌学、激烈争吵等沟通冲突。从家庭系统理论视角来看，该类亲子矛盾本质上是亲子沟通子系统失调带来的结果。有受访青少年表示表面顺从家庭要求，但内心情绪持续压抑，在难以承受时会出现情绪失控发火的情况。

4.2. “指责”何以成为惯性：家长端的多重压力与认知定式

家长的指责式沟通姿态，是外部抚育压力与内在认知偏差共同塑造的亲子沟通选择，并非个体偶然行为，遵循“外部现实压力－内在认知简化”的生成逻辑。高龄抚育带来的身心消耗是重要外部诱因，多数 70 后二孩家长同时承担职场工作与低龄子女照料任务，情绪容纳能力下降，容易将抚育压力投射到已经具备自理能力的长子女身上。家长的指责沟通具备情境性，并非一贯如此，身心松弛状态下能够开展良性沟通，只有在抚育疲惫、手足矛盾爆发等高压力场景，指责说教姿态才会凸显。

长期的抚育压力容易催生认知定式，部分家长片面解读“长幼有序”的传统伦理，手足发生矛盾时，不核实事件原委便要求长子女无条件退让[10]，忽视长子女渴望被公平对待的心理诉求。现实压力与认知偏差相互叠加，逐步固化为指责说教的惯性沟通模式。本研究访谈中仅有少数家长提及童年时期经历说教式教养，沟通方式的代际传递更多是基于家庭系统理论的理论推演。部分家长将批评说教等同于尽责养育，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指责式沟通成为部分大龄二孩家庭占主导的亲子沟通姿态。有受访母亲提及，日常兼顾工作与照料幼子精力透支，下意识会期待年长孩子更加懂事，不经意间就会以说教的方式和长子女开展沟通。

4.3. “讨好”何以成为策略：长子女的情感需求与现实权衡

家庭情感资源稀释重塑了长子女的沟通选择，催生讨好类沟通策略。二孩出生之后，父母的精力大量向年幼弟妹倾斜，长子女获得的亲子陪伴被压缩，亲子沟通内容窄化为学业问询，深度情感交流渠道匮乏，情感忽视问题显现。当长子女想要倾诉内心困扰时，部分父母会转移谈话焦点，切断子女的情感表达路径。在情感供给不足的家庭环境中，长子女分化出工具性与情感性两类讨好沟通策略：工具性讨好体现在行为层面，依靠分担家务、迁就弟妹换取家庭认可；情感性讨好表现为主动压抑委屈与不满。样本中长子女的讨好大多属于被动自保，目的是规避冲突、获取有限关注，而非发自内心认同自身角色。

同样面对情感资源稀释，长子女会分化为讨好、回避、对抗三类不同的沟通姿态。本研究表 1 对家庭的划分依据是高频出现的主导沟通姿态，并非对家庭做绝对、永久的归类，波动混合型家庭就体现出长子女会在讨好、对抗姿态之间来回切换。对比年龄、性别，个体感知到的父母偏心程度、过往亲子互动经历，对沟通姿态选择具备更强解释力。讨好式沟通是家庭系统压力之下的现实权衡，长子女以自我压抑换取家庭表面和睦，但内心积累大量委屈，为后续亲子沟通冲突埋下隐患。部分受访青少年谈到，自己倾诉校园烦恼时，家人关注点始终放在年幼弟妹身上，很难获得有效的情感倾听。

4.4. 循环的强化：家庭系统互动规则与文化土壤

“指责–讨好”并非单次偶然冲突，而是亲子沟通过程反复博弈之后沉淀形成的隐性互动规则，构建起自我强化的异化亲子沟通闭环。发生矛盾冲突时，家长采用指责说教的沟通方式干预事件，长子女通过退让、顺从快速平息矛盾；冲突平息后，家长片面判定指责沟通具备效果，进一步固化原有沟通习惯；长子女习得隐忍让步是规避冲突的有效手段，双向反馈不断加固失衡的沟通模式。

该闭环除显性言语沟通之外，还包含沉默、冷脸等非语言信号。青春期长子女可以敏锐捕捉到家庭氛围压力，主动选择讨好退让来防止矛盾升级，形成无需口头表达的隐性相处规则。该沟通模式的存续，深受本土家庭文化与外部支持缺位的影响。即便家庭成员没有直接言说“家和万事兴”，该文化逻辑依然潜移默化影响家庭行为，部分长子女主动压抑个人感受，优先维护家庭整体的表面和睦[11]。与此同时，现有社区家庭教育服务更多聚焦低龄儿童养育，缺少针对青春期长子女的情绪疏导与沟通指导，外部专业支持的缺失，使得家庭内部失衡的沟通闭环难以依靠家庭自身力量打破。有长子女受访者提到，即便自身并无过错，看到家庭氛围紧张，也会选择主动让步，独自承受委屈，维持家庭的平静状态。

5. 萨提亚视角下的干预思考与现实局限

5.1. 萨提亚模式介入的适用性与内在局限

萨提亚理论能够有效解析家庭“指责–讨好”的沟通形态，但直接照搬该西方理论开展本土家庭辅导，存在明显适配局限。萨提亚模式主张亲子间表里一致、完全平等的沟通，这与本土家庭传统的长幼权责观念存在显著冲突。本土家长大多秉持长辈权威的固有认知，认为子女应当谦让懂事，并不认可亲子对等对话的沟通方式，这就决定了实务中不宜直接套用理想化的“表里一致”标准。针对大龄二孩家庭的干预，应当立足家庭现实，优先推动家庭成员互相体谅彼此处境与内在情绪，而非追求形式上的完全平等沟通。

同时，萨提亚体系下的各类实操工具也难以直接套用于本土家庭实务。冰山日记依赖长期书面反思与情绪梳理，但高龄二孩家长普遍工作繁重，缺少时间与书写反思习惯，工具落地难度较高；PACE 沟通框架建立在亲子双方能够耐心倾听的前提之上，更适配家庭氛围良好的个案，难以应对本研究中已经出现指责、情绪压抑的失衡亲子沟通关系；其倡导的温和客观情绪表达方式，也和部分家长固有的说教评判式沟通习惯存在现实矛盾。脱离本土家庭现实机械套用西式工具，容易造成干预流于表面，难以真正

改善亲子沟通质量[12]。

5.2. 面向实务服务的优化方向

结合本研究总结的“指责–讨好”互动生成机制，立足基层社区服务现实条件，本研究提出觉察–共情–边界协商本土化三步干预流程，整套流程聚焦修复失衡的亲子沟通关系。第一，压力觉察干预，依托情绪卡片等轻量化社工工具，帮助家长识别抚育压力带来的情绪外溢与沟通偏差，引导家长看见长子女的情感沟通需求，改善指责式沟通姿态；第二，伦理共情调和，借助家庭会谈，以分层提问引导全家辩证理解“长幼有序”，厘清合理家庭责任与异化无条件退让之间的边界，保障长子女表达诉求的沟通权利；第三，边界协商与工具弹性适配，对萨提亚技术做本土化简化改良，用情绪便签替代冰山日记，对于抗拒干预的青少年优先建立专业信任，采用碎片化互动开展工作。同时依托社区讲座、家庭小组做好预防性科普。需要意识到，不良亲子沟通模式存在路径依赖，社会工作属于外部支持资源，家庭自身改变意愿才是干预成效的核心，实务工作应当理性预期干预效果。

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聚焦大龄二孩家庭的亲子沟通困境，“指责–讨好”是该类家庭在多重压力之下演化形成的一类异化亲子沟通闭环模式。基于10户大龄二孩家庭访谈资料分析，本研究证实该互动模式并非家庭成员个体性格缺陷，而是家庭情感资源稀释、高龄抚育压力、片面化长幼伦理认知、不良沟通代际传递多重因素耦合造成的家庭系统失衡结果，长子女的讨好行为本质上是家庭压力情境下的被动防御沟通策略。

在理论对话层面，既有研究多将大龄二孩家庭矛盾归结于同胞资源竞争，侧重分析冲突带来的心理后果，本研究对此形成补充修正，深入家庭日常沟通过程，揭示抚育压力与本土伦理认知共同塑造亲子沟通形态的内在逻辑，打破“长幼伦理必然诱发家庭冲突”的单一化论断。同时，本研究完善萨提亚家庭治疗理论的本土化实证讨论，证实理想化的表里一致沟通模式难以直接适配本土家庭语境，为西式家庭治疗理论在地化应用提供实证参考。

本研究属于小样本质性探索，依托受访者回溯性口述资料开展分析，缺少纵向追踪数据，结论仅具备理论迁移价值，不能直接推广至全部多子女家庭，有待后续更多围绕亲子沟通主题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实务层面，介入工作应当聚焦高龄家长抚育压力疏导、家庭长幼责任边界重构，警惕机械照搬西方家庭治疗工具，推进家庭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落地，从修复亲子沟通子系统入手化解大龄二孩家庭内部矛盾。后续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追踪弟妹成长、子女升学等家庭关键节点下亲子沟通姿态的动态演化；扩大样本量检验该类沟通困境的发生概率；改良本土化干预方案并开展实务效果检验。

基金项目

1)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课题“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广西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路径研究”(24SHB009)。

2) 广西科技大学博士基金项目“生育政策视角下妇女的再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以中国广西和韩国釜山为例”(校科博21S20)。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N]. 中国青年报, 2021-06-26(04). https://zqb1.cyol.com/html/2021-07/21/nw.D110000zgqnb_20210721_7-04.htm, 2026-08-23.

[2] 郑雨晗. 社会工作介入大龄二孩家庭同胞关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大学, 2021.

[3] 卢喜玲.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改善亲子关系的个案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2.

[4] 王思斌. 社会工作概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5] 维吉尼亚·萨提亚. 萨提亚治疗实录[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8.

[6] 高露瑞. 个案工作缓解多孩家庭长子女情绪焦虑的实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甘肃政法大学, 2023.

[7] 刘庆. 亲密与隔阂: 大龄二孩家庭同胞关系及其调适[J]. 南方人口, 2019, 34(5): 36-45, 68.

[8] 陈俍宇. 二孩家庭亲子关系调适的实务研究——以南京市 F 社区 W 家庭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 2021.

[9] 徐应恒. 长子女儿童情感忽视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22.

[10] 陆杰华, 韦晓丹. “全面两孩”政策下大龄二孩家庭亲子/同胞关系的调适机理探究[J]. 河北学刊, 2017, 37(6): 204-209.

[11] 何茜, 冉楚琪, 梁文艳. 同胞对青少年家庭养育资源获得的影响: 稀释效应和补偿作用[J]. 教育经济评论, 2025, 10(3): 87-110.

[12] 卜熠. 基于 PACE 模式的家庭亲子沟通干预研究[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0(18): 70-73.

附录 A. 编码示例

原始访谈片段	开放性编码概念	主轴编码类属	选择性编码核心范畴
F11：“我稍微有点不开心，爸妈就说我不懂事，要我多让着妹妹，不会问我为什么难过。”	父母简单否定长子女情绪；要求长子女谦让弟妹；忽视长子女情绪感受	家长指责说教、异化长幼伦理	指责–讨好循环
F31：“多帮家里做事、照看妹妹，爸妈对我的态度就能好一点。”	通过家务劳动、照料弟妹换取父母善待；被动付出获取关注	长子女工具性讨好策略	指责–讨好循环